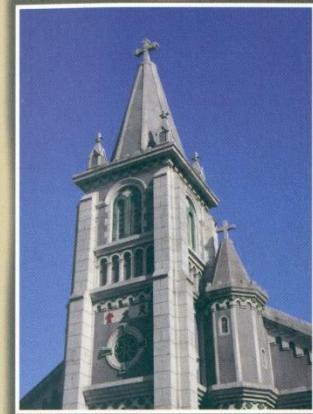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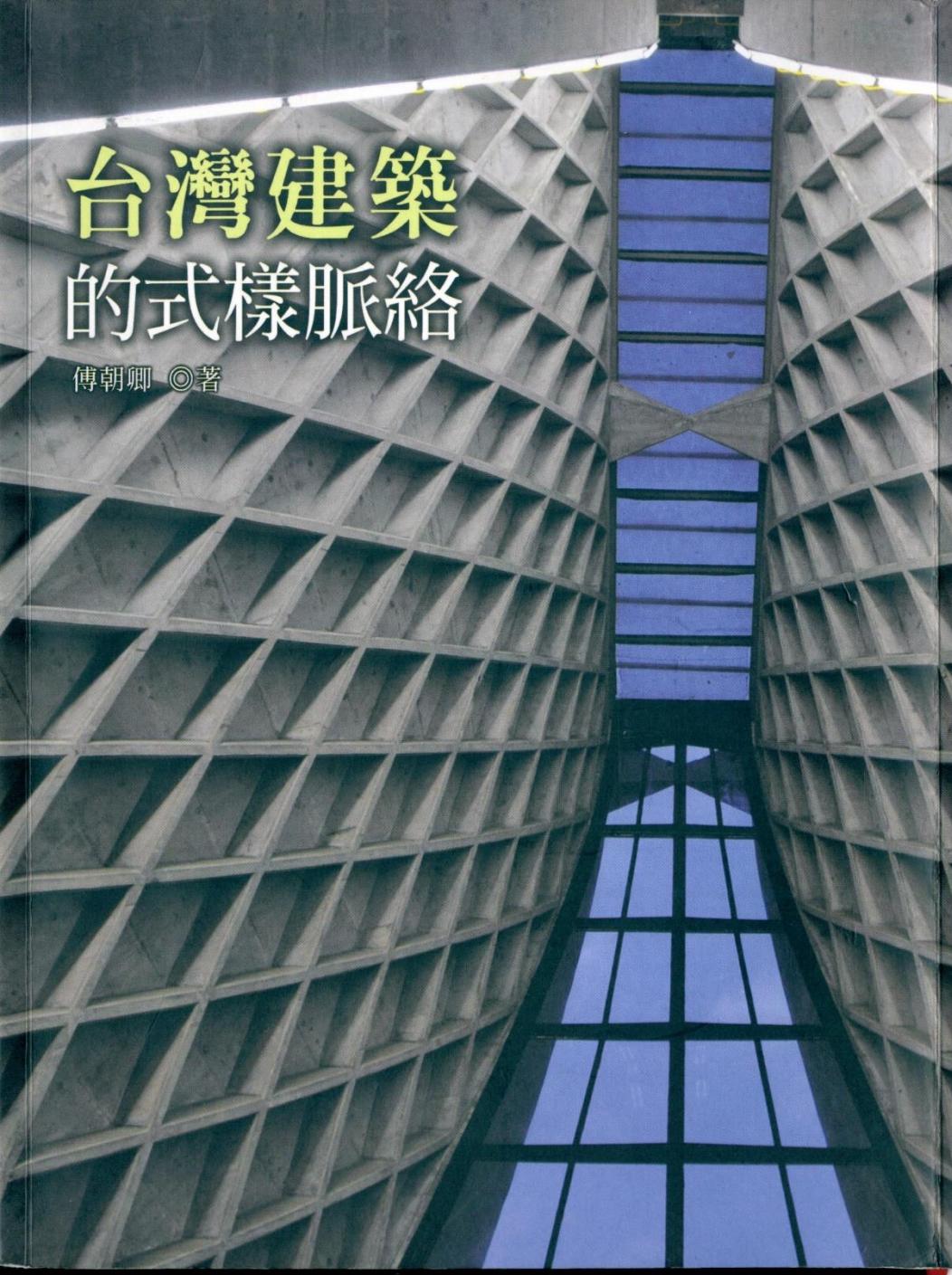


台灣建築 的式樣脈絡

傅朝卿 ◎著



◎作者

傅朝卿

傅朝卿，英國愛丁堡大學建築博士，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特聘教授。傅教授長期專注於台灣近現代建築史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曾任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主任及財團法人台南市文化基金執行長等職務，目前擔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古蹟與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聚落與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及推動世界遺產委員會委員。傅教授二十多年來以世界與台灣近現代建築與文化遺產保存為主要研究主題，著作包括期刊、會議論文、專書與研究報告與其它著作共數百種。傅教授的著作曾四度獲金鼎獎項的肯定，2009年也曾獲頒台灣建築學會最高榮譽的「建築文化藝術類獎章」及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與中國「全國高等學校建築學學科專業指導委員會」共同設置的「世界建築史教學與研究阿爾伯蒂獎」。

目錄



目錄

008 序

- 011 1. 閩南傳統式樣
- 012 (1) 背景
- 012 (2) 什麼是閩南傳統式樣
- 014 (3) 台灣閩南傳統式樣建築的發展
- 018 (4) 閩南傳統式樣重要元素
- 020 (5) 台灣閩南傳統式樣代表性建築



033 2. 西洋歷史式樣

- 034 (1) 背景
- 034 (2) 什麼是西洋歷史式樣
- 037 (3) 台灣西洋歷史式樣建築的發展
- 043 (4) 西洋歷史式樣重要元素
- 045 (5) 台灣西洋歷史式樣代表性建築



065 3. 東洋歷史式樣

- 066 (1) 背景
- 066 (2) 什麼是東洋歷史式樣
- 069 (3) 台灣東洋歷史式樣建築的發展
- 074 (4) 東洋歷史式樣重要元素
- 077 (5) 台灣東洋歷史式樣代表性建築



帶組成。第一層是獅頭、萬字紋與花飾，第二層為與第一層相對應的幾何線腳，第三層為更細分的裝飾，只出現於相對第一層的獅頭及花飾的部分。在室內，營業廳的柱頭及天花線腳，也都各有不同的花草紋樣。



台灣建築的式樣脈絡

東洋歷史式樣

台灣建築的 式樣脈絡





(1) 背景

作為一個殖民者，日本政府在統治台灣之後，當然不會放棄引入各種日本文化，以期在殖民地形塑母國文化，在文化上是如此，在建築上自然也不例外。因為政治意涵、文化意涵、懷鄉情結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各種不同日本風格的建築也於日治時期開始傳入台灣。台灣日治時期展現東洋風情的建築，基本上都是源自於日本歷史上出現的式樣。相較於西洋歷史式樣多數出現於官署及公共建築，應用日本元素的多數集中於目前仍然保存之日治時期神社、武德殿、傳統佛寺、日本劇場、日本宿舍、日本旅館、料理店及日本花園中，而其它建築中也有局部使用日本建築語彙的情況。這類的建築過去因為被認為帶有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或神道色彩，因此被拆除了不少，最後因為民國74年（1985）桃園神社拆除事件在台灣引發大量的討論，目前所尚保存者已逐漸被指定為文化遺產。

(2) 什麼是東洋歷史式樣

東洋歷史式樣，指稱的是參酌日本傳統建築中的各種式樣為藍本而新建的建築，依其屬性可以歸納為「傳統日本式樣建築」及「日本古典式樣新建建築」兩類。所謂的「傳統日本式樣建築」是指依日本本土各種傳統建築約定俗成的形式與構造所興建之建築，基本上是一種全盤移植的模式。由於日本傳統建築中不同的建築類型常會有其獨特的規制，若依此而分，「傳統日本式樣建築」也約略可以分為「神社」、「寺殿」及「民居」三大類。神社是最具日本道統色彩的建築，其建築都依

一定的規制而建，可稱為「神社式樣」。由於神社在日本源出幾個不同的系統，每一種神道宗派的祖社建築中存在著差異，祖社建築型態也成為一種特殊的風格。伊勢神宮為代表的「神明造」、出雲大社的「大社造」、住吉大社的「住吉造」、春日大社的「春日造」、賀茂社的「流造」與宇佐神宮的「八幡造」是日本神社幾種主要的風格。神明造與流造是兩種數量最多的風格，前者屋頂為直線造型，後者為曲線。另外，自古以來日本的神社即有所謂的「社格」之分，亦即神社的等級。明治時期，社格重新調整，分為官社與地方性神社，官社又分為國幣與官幣社兩種。每種又分上、中、下三等。國幣社舉行祭典時是由日本國庫支付費用，官幣社則由日本皇室支付。地方性神社分府、縣、鄉、村及無格社，分別由所屬層級之地方政府提供祭祀時之帛料。

除了神社之外，日治時期也有不少建築依傳統日本寺殿建築之空間與造型構成所興建，以求表現日本風情，其中以武德殿、佛寺及劇場數量較多，可以統稱為寺殿式樣。武德殿是除了神社之外，另一種最具日本色彩的建築類型，是日本人練習武術之場所。由於練武在日本屬於一種傳統的技藝，而且也牽涉到一定的禮制，因而在興建武德殿時，建築師也都會採取傳統的規制。一般而言，一個標準的武德殿都設有道場（柔道與劍道）、席位區（長官、教師與選手）與神龕，有些較大的武德殿也會附設有練習射劍的弓道場。1920年代，日本警界推廣敬神主義，在演練武術前後必須舉行神道儀式，使武德殿的儀禮特性更加強化。可惜台灣現存武德殿的神龕空間均已廢除，



只有東勢武德殿仍有跡可尋，但亦已無作用。由於武德殿的主要空間為大跨度的道場，因而在外貌造型上通常也是以一個能涵蓋道場的大屋頂為主導元素。在台灣的武德殿中，採用入母屋屋頂的最多，其與中國傳統建築中的歇山屋頂類似，屋頂上的各種飾物也都遵循傳統的規制，有些武德殿屋瓦上還印有「武」字。除了大屋頂之外，多數武德殿也會有門廊之設置，其屋頂也多數採用入母屋屋頂。京都大日本武德會本部武德殿（1899）是一座「武德殿」的原型，東京大學的七德堂（1938，內田祥三）則是比較晚期興建武德殿的代表。

所謂「日本古典式樣新建築」指的是以新材料新構法，模仿日本古典建築的新建築。因現代主義之崛起而退居次要角色之古典主義思潮在平靜了幾年之後，又於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復辟，其主因乃是當時盛行的民族政治意識型態。這種現象在崛起於此時之極權政府（義大利、蘇聯和德國）中顯得特別的明顯。在亞洲方面，日本之建築界也於1920年代起，面臨了到底要選擇國粹主義之古典式樣或是國際主義之論辯，以鋼筋混凝土建造日本各類傳統式樣之風氣也隨之在此期間更加興盛。「帝冠式樣」及「興亞式樣」是兩種受到較多關注的式樣。

「帝冠式樣」建築其實是源自於下田菊太郎之對1920年（日大正9年）日本國會議事堂競圖作品提出該採用「帝冠併合式」而來。就建築構成而言，這種式樣是指基礎及屋身採用西方古典建築形式，而屋頂採用日本皇宮建築慣用的固有式樣，其他各部則取各類建築之長，經消化後合併使用之建築。在這種態度之下，一棟帝冠式樣的建築通常會同時兼具日本大傳統

屋頂及西方古典建築之屋身與語彙。日本京都的京都市美術館（1934，京都市建築課）與東京帝室博物館（1937，今國立東京博物館，渡邊仁）即為日本本土之帝冠式樣作品。「興亞」式樣建築，此種式樣之興起乃是自國粹主義在日本抬頭，日本軍國主義向外擴張後，在日本本土及海外佔領區以日本趣味加之鋼筋混凝土現代屋身後形成之建築。當然所謂「帝冠式樣」及「興亞式樣」其出發點並不相同，但是其於建築構成上之本質從某個層面上而言差異並不大。主要的差別在於前者強調是日本趣味之大傳統屋頂加上西方古典建築之基座及屋身，而後者則是加上較簡化之現代式屋，不過此差別有時是極難分的十分清楚。日本名古屋市廳（1933，名古屋市土木部建築課）與東京軍人會館（1934，川元良一，今九段會館）都是興亞式的建築。

（3）台灣東洋歷史式樣建築的發展

在台灣，東洋歷史式樣與神社、武德殿、佛寺與日本宿舍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日治時期，日人在不同時期總共以傳統式樣及構造方式興建了兩百多棟大小不一的神社，這種舉動明白的顯示出日本殖民者意圖在台灣廣佈日本文化之心。台灣神社（1901，伊東忠太）、台中神社（1912，伊藤滿作）、嘉義神社（1915，伊藤滿作）、台南開山神社（1915改建，島田宗一郎）、台南神社（1923，森山松之助）及高雄神社（1929，岡本源造）等都極為有名。可惜戰後日治時期興建的神社大多因政治因素而拆除或改建，只殘留部分或無跡可尋，





目前只有桃園神社（1938，春田直信，今桃園忠烈祠）保存較為完整。神社中，有國幣社、官幣社、縣社、鄉社及無格社之不同等級，其中台灣神社屬於官幣大社，台南神社屬於官幣中社，新竹神社與台中神社屬於國幣小社，社格較高。縣社、鄉社分別有九座，其它神社大多屬無格社。戰爭末期所興建的台灣護國神社則屬於靖國神社系統，供奉為國捐軀的軍職人員。除了神社之外，在某些需要傳達日本神道色彩的特定的準神社類紀念性建築物中，也會被採用神社式樣，後來擴建為台南神社的原北白川宮御遺蹟所（1902）與擴建自原學務官僚遭難碑址的芝山巖（1927）即為二例。

日治時期，武德殿普遍設於台灣城鎮與機關學校之中，為數亦多，起初都為木構造，1920年代以後逐漸改建為鋼筋混凝土。前者以第一代台中武德殿（1913）為代表，後者則以高雄振武館（1924）、彰化武德殿（1930）、旗山武德殿（1934）、大溪武德殿（1935）、臺南武德殿（1936，臺南州土木課營繕係）與南投武德殿（1938，鈴木金吉）是現存情況較佳者。在佛寺方面，日人於日治時期引進日本佛教共有七宗十二派，其中以真宗本願寺派、曹洞宗、臨濟宗與淨土宗信徒較多。截至1941年（日昭和16年）的統計，台灣一共有日本佛寺六十五座。這些日本佛教宗派在興建新的寺院時，也都會使用與台灣本土佛寺閩南風格差異很大的日本傳統佛寺的式樣，有些是依循傳統的木構架，有些則以加強磚造或鋼筋混凝土仿木構而建，鎮南山護國臨濟禪寺（1912，圓山護國臨濟禪寺）、北投鐵真院（1905，普濟寺）、虎尾禪寺（1920

年代）、火山大仙寺（1925）與金鳳山員林寺（1931，鈴木金吉）屬於前者，中和圓通禪寺（1926）、曹洞宗台北別院鐘樓（1930，東和禪寺，入江善太郎）、台中寶覺禪寺（1931）與淨土宗台北別院開教院本堂（1937，舊善導寺，已拆）屬於後者。1920年代起，寺殿式樣在日本也開始被應用於佛寺與武德殿之外的建築中，東京明治神宮寶物殿（1921，大江新太郎）、東京歌舞伎座（1924，岡田信一郎）及東京震災紀念堂（1930，伊東忠太）都是很好的案例。在台灣，這類的建築表現也出現在劇場建築上，臺南的宮古座及台北的榮座均甚為宏大。

另一方面，日本傳統民居式樣也於台灣日治時期持續出現於各地的日本人宿舍、旅館、料理店與溫泉浴場之中，數量頗多。已不存的日月潭涵碧樓（1900年代）、關仔嶺公共浴場（1914）、宜蘭公共浴場（1915）及台灣軍司令官官邸（1929，淺井新一）均擁有濃厚的日本風情。在現存的例子中，台北梅屋敷（1900，國父史蹟紀念館）、宜蘭廳長官舍（1906，宜蘭設治紀念館）則是已經重新規劃後的建築。而台灣各地為接待日本皇室成員而興建的招待所及為了接待皇太子於1923年（日大正12年）訪問台灣的皇室行館，基本上也多採民居式樣，角板山貴賓館和館（1914，舊蔣介石行館與復興山莊）、金瓜石行館（1923）及高雄壽山館是為代表。

1930年代後，由於政治局勢的改變，台灣也開始出現帶有濃厚意識型態之日本古典式樣新建，其中幾個重要之建築是集中於高雄地區，這當然與高雄在當時被日本視為南進東南亞與





太平洋島嶼之最主要基地有直接的關係。「帝冠式樣」與「興亞式樣」是日本古典式樣新建中兩種最特別的式樣。台灣近代建築界「興亞」式樣建築，大阪商船台北出張所（1937，渡邊仁）及產業金庫高雄支部（1940年代初）是為代表。除了上述兩種式樣外，1930年代中所興建之高雄州廳（1931，高雄州土木課）、台北高等法院（1934，總督府官房營繕課，今司法大廈）及澎湖廳舍（1935）則也別具特色。這幾座建築基本上都有西方歷史式樣建築之構成，但卻都有局部之日本趣味裝飾及變形之日本屋頂，有些日本學者將之稱為「日本趣味建築」。

此外，台灣還出現一種內涵質變的傳統日本式樣建築。1937年（日昭和12年）以後，台灣雖然是處於一種戰爭體制之中，各種傳統日本式樣建築仍然持續的出現。就建築之構成而言，這些建築與以前之同式樣建築並無多大差異，但是在機能本質上，卻因為軍國意識型態之導入而使建築之本質產生變化，使單純的傳統建築沾染上政治之氣氛。1937年（日昭和12年）中日戰爭後，日本政府更企圖藉由神道之崇拜來表彰忠烈，激發軍國及愛國思想。1939年（日昭和14年）3月，日本本國各地之招魂社改為護國神社。在台灣方面，則由總督府在台北大直（今圓山忠烈祠址）創立一「台灣護國神社」，1942年（日昭和17年）5月完工。在台灣護國神社中所供奉的有為日本殉職中與台灣有關之人，包括有中日甲午戰爭時病死於彰化之陸軍少將山根信威等人。除了護國神社之設立使台灣神社之內涵與日本本國之靖國神社有了內容上之呼應外，台中神社亦於1940年（日昭和15年）改建，並且與新竹神社於1942年（日

昭和17年）11月同時升格成為國幣小社。在此之前，台灣只有台北之台灣神社及台南神社屬於格局較高之官幣神社，可以推展政策事宜。配合1941年（日昭和16年）4月開始的皇民奉公運動，台灣總督府藉由台中及新竹兩神社之升格，增加了兩個可以推行皇民化運動之中心。此外台灣神社也配合大肆整修，於1944年（日昭和19年）6月17日於台灣始政四十九週年當日，改稱為神社中最尊貴的稱號，成為「台灣神宮」。神社之升格與改名，在日本神社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而台中、新竹與台灣神社社格之改變發生於太平洋戰爭轉趨激烈之時，與日本當局希望藉此賦與神社更高之皇國權威，強化思想中心以扭轉戰力有必然之關係。

除了神社產生質變之外，日本為了配合戰爭之需，於1937年（日昭和12年）9月開始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竭力推廣所謂的「八紘一宇」及「舉國一致」之精神。台灣因其南進基地之特色，所以推廣國民道德以貫徹神道精神及皇民化之效為日本殖民當局所急欲達成之目標，同時也鼓勵青年參與有教化性質的團體活動。此期間所興建之台北國民精神研修所（1937）與台中州產業組合青年道場（1939）也均負有此種任務。二者均是木構造，在空間配置雖以機能考量為主，但在造型上均為民居式樣。

除了公共建築外，為了徹底推動皇民化，日本殖民政府也在台灣百姓之民宅正廳擺設上推動近乎強迫性之改造。1936年（日昭和11年）11月台灣總督府舉行「神宮大麻」（一種代表天照大神的神符）頒佈儀式，改以硬性規定每戶於家中供奉神

宮大麻。1937年（日昭和12年）12月，台灣神職會公佈「本島民屋正廳改善實施要項」，指出「民屋正廳之改善為貫徹本島皇民化的絕對要件。」在此要項中甚至提出了家庭神座標準配置，冀由供奉日本傳統之神宮大麻、神社神符與代代靈祖來取代台灣傳統信仰中之神明與祖先。台灣之許多民宅因而在此期間內，出現假象式的皇民化成果，以應付日警之檢查。不過這些強制性的文化改造成果，在戰後日本人撤走之後，已經不復存在。東洋歷史式樣也隨著日本人的離開，退出了台灣的建築舞台。

（4）東洋歷史式樣重要元素

台灣日治時期東洋歷史式樣建築，有其各自的表現手法與特殊的建築語彙。在屋頂、門廊、木構元素與細部、鋼筋混凝土仿木構元素與細部、天花、榻榻米、空間佈置、傢俱與庭園中，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種日本建築的特徵。傳統日本建築中，屋頂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特徵，其雖然不像西方歷史式樣建築中的屋頂差異如此的大，但是仍然有數種不同的差異，以妻切屋頂（中國建築中的懸山）及入母屋屋頂（歇山）最為普遍。妻切屋頂為雙坡式的屋頂，空間為長方型，屋面突出於短向屋身山牆之外，許多神明造與流造的神社本殿之屋頂均採用之，伊勢神宮與賀茂神社中均可看到。在台灣，台灣神社、台南神社及桃園神社中都有妻切屋頂的例子。入母屋屋頂雖然仍為長方形空間，但卻為四坡式的屋頂，許多寺院及武德殿均加以採用，京都東大寺的山門，京都的武德殿均屬之。在台灣，

神社以外的重要日本式樣建築也大都採用入母屋屋頂，台南北白川宮御遺蹟地祭堂、鎮南山護國臨濟禪寺、北投普濟寺、中和圓通禪寺與台南彰化及南投等地的武德殿均是很好的例子。方形屋頂（四角攢尖頂）則可以在高雄市役所、高雄驛以及一些較小規模的建築中如台中放送局播音塔（1908）、台北放送局播音塔（1910）台北明治橋燈塔（1930，今中山橋，已拆）中看到。

有時候，屋頂的山牆面，亦即所謂的「破風」也會出現於主要屋頂上，其作用一為門廊之頂，另外一種作用很像西方建築閣樓上的老虎窗。破風為圓弧形者稱為「唐破風」，三角山形的稱為「千鳥破風」，桃園神社社務所、台南武德殿的門廊、屋頂及高雄驛的屋頂中都有破風的存在。除了屋頂本身的形式之外，屋頂上的屋瓦及山牆裝飾懸魚則是屋頂上具日本特徵的元素。屋瓦從材料上基本上為土質黑瓦與銅瓦為多。屋脊收頭的瓦通常造型特殊，稱為「鬼瓦」的最多，少部分為鴟尾。有些建築除了主屋身之外，還會設立向拜（門廊），其屋頂也多是採用唐破風或者是入母屋屋頂。

傳統日本建築是木構造為主，因而新建築若採取木構造，則能較清楚的表現日本風情。基本上，台灣日治時期這些建築的木構可以分為結構部分與裝修部分。結構部分以柱子、虹樑、斗拱、蟇股及木鼻最具特色。「蟇股」是屋簷下兩道水平構材間的元素，其名乃是因為構件乍看下，有點像張腿青蛙的股部。木鼻是水平構件的收頭，有具象的圖像也有抽象的圖樣。裝修部分為結構材間的填充構件或者是裝飾細部，門窗也



可以屬於裝修之部分。傳統的和室門是室內經常看到的元素，抬高建築的欄杆、木門扇與支摘窗則是建築重要的外貌特色。除了木構件外，應用於木構造元素的五金構件也是特色之一。桃園神社與鎮南山護國臨濟禪寺是現存日治木構建築中保存較好者。在民居式樣中，水平層層相疊的雨淋板則是重要特色。

日治時期，台灣除了真正的木構造之外，日人還以鋼筋混凝土模仿傳統木構造興建許多建築。在這些建築中，我們可以看到相當精緻洗石子仿木構細部，包括上述木構中的柱子、虹樑、斗拱、薹股、木鼻及欄杆，可以說是應有盡有。高雄市役所與各地的武德殿及鋼筋混凝土佛寺中都可以看到這類的元素與細部。榻榻米是日本在空間設計上重要的元素，而且不僅存在於日本風情的建築物，就連一些洋化的建築中，也會設有榻榻米的空間，尤其是所謂「座敷」的起居空間。榻榻米是一種模矩化的元素，因而很容易藉之來控制空間的大小，而榻榻米室也都會配上特殊的日式擺設。現存的日治建築中，除了住宅、招待所與溫泉旅館之外，保存有榻榻米的空間的並不多，北投普濟寺是現存的少數特例，整個大殿仍然全部保存著榻榻米地板。與地板相對的，許多日治建築中有系統的藻井式分隔與木質建材的天花與隔板也是日治建築的另一特徵，只可惜現存的完整的並不多。

除了影響建築外貌很大的屋頂與木構等主要元素外，有許多日治時期的建築雖然基本上是西洋風情、台灣風情或現代風情，但是在建築之中，仍然可以看到局部應用傳統日本圖騰的例子，例如在台南勸業銀行中就出現日本的福神浮雕，後壁阮宅有富士

山，高雄武德殿有類似箭標的裝飾。另外在一些日本古典式樣新建築中，東西方元素混合而成的特殊柱頭型式及細部也都是帶有新意的日本風情，而這種特殊日洋折衷的處理方式也見之於圓通禪寺等佛寺中。另一方面，原本置放於神社前的銅馬也是一項極具日本色彩的元素。雖然大部分的神社已拆，但是在某些城市中則保存了銅馬及高麗犬，位於原台南神社（今臺南市忠烈祠）前的原台南神社銅馬及高麗犬即為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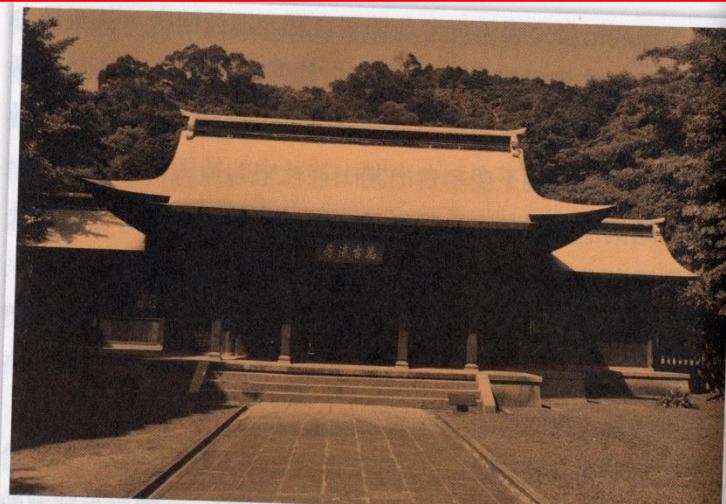
建築物之外，庭園也是很表現日本風情之處。小橋流水與石燈幢則是最普遍的日本庭園元素。而日本庭園除了存在於公園等城市開放空間之外，也存在於公共建築與住宅的庭園之中。而且不是日式風情的建築也會設置日本庭園，而且也會存在於西洋風情、台灣風情或現代風情的建築之中。台北新公園（二二八紀念公園）、台北總督官邸、總爺糖廠、甚至是臺中清水的黃宅與神岡的筱雲山莊中都還存在有日本庭園的痕跡。除了庭園，日本傳統家具器皿也可以表現日本色彩，不過保存於建築中的並不多，臺南開山神社中的神輿（神轎）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且本身就像是一座日本傳統建築，桃園神社的賽錢箱也不多見。

(5) 台灣東洋歷史式樣代表性建築

原桃園神社（桃園縣忠烈祠）

位於桃園市虎頭山上的桃園縣忠烈祠（原桃園神社），是台灣日治時期興建兩百多座大小神社中，唯一一棟保存狀況較佳者，由春田直信所設計，於1938年（昭和13年）舉行鎮座





▲ 原桃園神社拜殿外貌。

祭落成啓用，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豐受大神、造化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及少彥能命）及明治天皇等為祭神。戰後初期的民國35年（1946），桃園神社改為新竹縣忠烈祠。民國39年（1950）新竹分治，桃園設縣，改名為桃園縣忠烈祠至今。整座神社依山勢而分三層而建，軸線對位於市中心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紀念碑。整座神社由參拜道串聯庭園與建築而成。從外圍道路拾階而上的第一層庭園於參拜道兩側置有石燈幢，其後為鳥居。鳥居為神社象徵性入口，也是空間層級的指標，現存者頂部之橫木已毀，為桃園神社範圍形式上的入口，由此往兩側延伸圍牆包被整個神社的範圍。在進入神社本體之前的庭院中，則有西淨與東沐兩個建築，西淨為進入神社本體前洗手以

淨心的地方，亦稱為「手水舍」，由四根柱子支撐銅瓦屋頂而成，亭中有長方形水槽。東沐為社務所，格局形式如同傳統民宅，門廊為唐破

風形式。由東沐再往內則有銅馬，目前只剩一匹。由此可再由階梯上兩層的平台而抵神社本體。

神社本體由中門、拜殿與本殿而成。中門為正式的大門，由此延伸第二道迴廊圍牆界定本體範圍。中門由十二根柱子支撐銅屋頂。進入中門之後又為庭園，其端為拜殿，分中央及左右室三部分，中央屋頂為前緣中央略為拉長的歇山頂（日人稱入母屋屋根），兩側為懸山頂（切妻屋根）。目前拜殿中存有幾塊改為忠烈祠後所設的匾額及日治時期留下來的賽錢箱（樂捐箱）。拜殿後接一廊道通往本殿，規模雖然不大，卻為神社最神聖的空間，一般人並無法接近。本殿設於高台之上，必須爬八階樓梯始可抵達，樓梯尺度很小，並非供一般人之用，神職人員亦需小心用腳尖登踏，以收崇敬之心。在式樣上，本殿是屬於日本傳統中所謂的「流造」，屋頂前屋面比後屋面長，但屋脊上原設有堅魚木及千木的構件，但已不存，四周亦設有迴廊。有一段時間殿中供奉有鄭成功、丘逢甲與劉永福，甚為



▲ 原桃園神社本殿外貌。



特別。

在桃園神社中，我們看到的不只是東方傳統的合院空間，其構造特色及細部裝修頗具唐朝風格。在不同建築中，保存木材原色的木構架非常優美的組立而成，門窗也都別具特色，拜殿的支摘窗為格子形式，尤為精細。不同木材間的接合點或是木材的收頭大多數使用銅質五金構件，一則強化木質構件，一則有美學效果。各種不同的屋頂形式、銅瓦及黑瓦也都存在著不少可觀之處。

台北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

日治時期，在台灣活動的日本佛教宗派中，妙心寺派則是日本臨濟宗之眾多支系中之一派，而且也是勢力最大的一派。初期臨濟宗妙心寺派的發展以1898年（日明治31年）日本僧人得庵玄秀禪師受當時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之邀來台弘法佈教為代表。當時得庵玄秀禪師在圓山西麓，建一禪堂稱「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自1910年（日明治43年）3月破土，至1912年（日明治45年）主體建築竣工，並於6月21日舉行落成佛像安座大典，是台灣日治時期唯一冠以護國之名的佛寺。落成時該派代理管長（該派主持人）氣上宗詮曾經親自到台灣主持落成典禮。後來，該派又有長谷慈圓、天田策堂、高林玄寶、森元成、飯塚江嶽等人來台灣布教。日治時期，臨濟宗妙心寺派在台灣急速發展，所轄的寺院及弘法道場曾經達到二十五座，此外並有一百十五座相關寺院。

戰後，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轉由國人管理，後來轉為財



▲ 臨濟護國禪寺大雄寶殿外貌。

團法人台北市臨濟護國禪寺。1984年（民國73年）臨濟護國禪寺為配合新的都市計畫，將原來座北朝南的大雄寶殿轉向為座東向西，以圓山為背。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興建過程，歷時三年，原有格局十分完整，包括有山門、法堂、大雄寶殿及附屬方丈堂。然而若與日本本土的禪寺相較，臨濟護國禪寺規模並不很大，也無中軸線之配置，山門位於正殿偏右前方，正殿右方為生活空間庫裡，庫裡右前方為僧房，正殿左方之建築是鎮守土地之神舍。前方有鳥居，正殿後方有一棟建築，應為奉祀開山祖之處開山堂。然而在歷經戰亂與時代變遷，臨濟護國禪寺目前僅存大雄寶殿與山門兩棟日治時期的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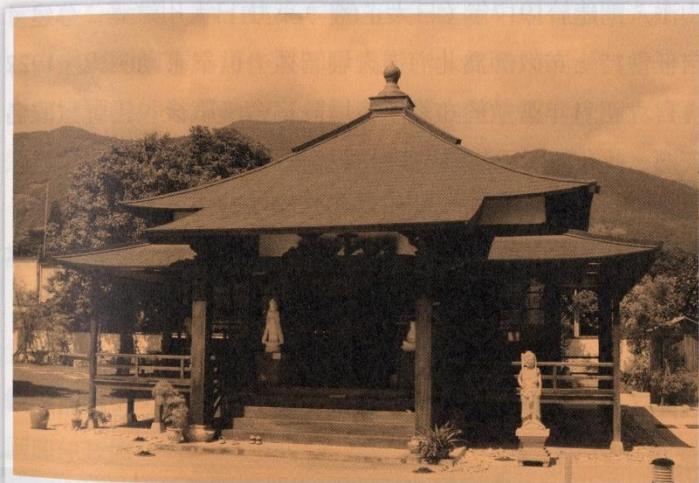
臨濟護國禪寺大雄寶殿為重簷入母屋造（歇山頂），立於一個抬高的基座之上，供奉釋迦三尊，空間格局宛若一個倒「凸」字，前半的空間（外陣空間）寬三開間，後半的空間（內陣）寬五開間，四周有迴廊。基座外表為規則的六角形石砌，迴廊則繞以欄杆，上面刻有奉獻者的名字。整座建築為木構造，由圓柱支撐斗栱上承木屋架構成結構體，柱礎有內凹之曲線。柱間為木板牆、木窗或木門。斗栱屬於禪宗的作法，形式因所在位置不同而異，基本上尺度比台灣傳統閩南建築的斗栱為大，位於重簷間的斗栱極為壯碩，角落的斗栱還有往外垂下的「尾垂木」，在台灣極為罕見。而斗栱與斗栱間則有日本傳統木造建築常見的「薹股」構件。柱與柱間則有虹樑與貫木等水平構件相連，角落構件則以「木鼻」為端部收頭。與外部

類似，臨濟護國禪寺大雄寶殿室內之木構架中亦可見到斗栱與薹股兩種元素，而天花為傳統作法。在屋頂方面，此殿極為優美，正脊、垂脊及戗脊均以鬼瓦為



▲ 臨濟護國禪寺大雄寶殿木構造細部。

端，山牆有懸魚，也有三座斗栱支撐出簷。在山門方面，其是一棟結合承重磚牆與木構造的二層樓建築，屋頂形式也是屬於入母屋造，上鋪日本瓦，屋脊末端亦有鬼瓦。二樓部分則設有欄杆，角落欄柱柱頂以銅質寶珠為飾，屋身柱間有連子窗與板



▲ 原吉野真言宗布教所外貌。

門，亦飾以銅質五金。臨濟護國禪寺大雄寶殿與山門可以說是日本佛寺木構造建築在台灣的最好代表。

原吉野真言宗布教所（今吉安慶修院）

日人治台之後，台灣的土地與人口條件逐漸成為日人移民之主要考量。1910年（日明治43年）台灣總督府編列預算開始執行移民事業，並以敕令第230號設立「移民事務委員會」、「移民課」、「移民指導所」等官方機構，並以花蓮港之七腳川、豐田、林田等三村為主要目標。由於首批移民至七腳川的





日人之原鄉為德島縣的吉野川治岸，因此當年六月，便將七腳川更名為吉野。吉野村在移民增多之後，原鄉的宗教傳統信仰也隨之被引入台灣，其中真言宗乃空海和尚所創，原以京都東寺為永久道場，為其總本山。吉野真言宗布教所屬於真言宗高野山派，創建於1917年（日大正6年），由日人川端滿二募建，並自任住持，布教師為北海道人堀智猛，供奉不動明王。1922年（日大正11年）並於布教所旁增設宿舍。戰後，吉野村改名吉安鄉，此布教所為苗栗人吳添妹接管，改名慶修院。

吉野真言宗布教所空間組織相當簡潔緊湊，本殿寬三間，深四間。本殿前有出簷形成入口空間，日人稱為「向拜」；本殿後有布教壇（佛壇），目前緊鄰佛壇之廂房後來增建之貌。這樣的空間規制，與日本傳統佛寺空間區分外陣（參拜空間）與內陣（神佛居所）是頗為一致的，而向拜不大，也帶有拜殿之意象。在造形上，吉野真言宗布教所是立於一座高床式的台基之上，此台基下並以大卵石收邊，因建物抬高，所以在正面及側面均設有高欄，



▲ 原吉野真言宗布教所石佛迴廊。

線條簡單，沒有多餘之裝飾，入口的向拜由兩根立柱支撐外部的屋頂，木構架上有斗棋，並以木鼻收頭。木殿屋頂為日本傳統寶形造，接近中國建築的四角攢尖頂，重簷形式，屋面為金屬板，最頂部有寶珠飾。本殿與佛壇之室內裝修均為簡單之木材，十分簡樸，除了建築本體之外，庭院中還有四國八十八所石佛迴廊，部分為舊作，部分為新作，此乃川端滿二當年恭請自四國，另外，不動明王石雕，「百度石」及「光明真言百萬遍石」，也都是重要的文物，與建築本體密不可分。

原宜蘭廳長官邸（宜蘭縣治紀念館）

1895年（日明治28年）日本開始統治台灣後，於同年6月於宜蘭城設置台北縣宜蘭支廳，二年後改宜蘭支廳為宜蘭廳，陸續在南門外圍興建政府相關建築，包括監獄署、廳舍及官員宿舍，將行政機構遷至舊城南門外圍，其中廳長官邸由日治時期首任宜蘭廳

▼ 原宜蘭廳長官邸外貌。





▲原宜蘭廳長官邸室內和室。

長西鄉菊次郎興建於1906年（日明治39年）。戰後，原宜蘭廳長官邸成為宜蘭縣長的官邸。隨著宜蘭市區的發展，都市計畫的更動，宜蘭縣政府亦於1997年（民國86年）遷至市郊，區域內老舊的建築開始面臨拆除的命運。由於官邸是歷經二十多任地方首長居住，深具歷史意義，庭院內更有一棵百年樟樹，見證歷史，各界開始提出保留這些日治時期官舍的呼籲。最後共有三棟被保留下來，最大的一棟便是原宜蘭廳長官舍，經多方討論，再利用為宜蘭設治紀念館。

宜蘭廳長官邸，佔地800坪、建築面積74坪，與其他高等官舍一樣，是一棟融合了日本木造房舍與西洋古典建築形式的和洋一體的建築。正向入口的右邊昔日為居住空間，基本上為日本傳統的東洋式樣，外貌上為雨淋板及日式屋瓦，室內則為木地板或榻榻米地板，天花亦為木製。入口的左邊昔日為接待賓

客的客廳，基本上偏向洋式作法。除了官邸建築外，庭園也是本館最具特色的空間。有枯山水、枯石流的日式庭園景觀，更有老樹花木、拱橋池塘，環境幽雅。由於歷經世紀歲月，庭園生態極為豐富，其中大樹多是本地植物，更為珍貴。官邸後方的圍牆，是以傳統的蛋白、牡蠣殼粉、糯米粉漿等材料為黏著劑，砌石而成。在各種展示資料之外，館內也保留數間房間的原貌，以使人得以更加清楚日治時期木造官舍的構法。

原日本武德會台南武德殿（今台南忠義國小禮堂）

1895年（日明治28年），大日本武德會創建於日本京都，提倡尚武精神，同時也逐漸發展出武德殿的建築特徵。隨著日人治台，台北、台中與台南也於日1900年（日明治33年）成立



▲原日本武德會台南武德殿外貌。



▲ 原日本武德會台南武德殿入口破風。

武德會委員部，並於1906年（日明治39年）正式成立「大日本武德會台灣支部」。台南武德殿原位於大正公園（湯德章紀念公園）東側，後來於1936年（日昭和11年）重建，所在地為當時臺南神社外苑之東北隅，緊接著臺南孔子廟。武德殿為日本宣揚其傳統武道之場所，當時在台灣各大城鎮均設有類似之設施，今天留存的除台南外，尚有台中、彰化、旗山武德殿及高雄振武館等，其中當以臺南武德殿規模較大，設計者為臺南州土木課營繕係，設計及施工品質均較高。

基本而言，台灣的武德殿採用日本傳統的社殿規制與風格。原來的武德殿除了本體之外，還設有大弓場（射箭場）與場塹，不過戰後均已拆除，只剩本體。在空間方面，武德殿本體主入口設於二樓，必須拾階經過門廊而入，一樓為各種附屬服務空間，二樓為主體大空間，西面為柔道場，東面為劍

道場，北面正對入口則為神棚（神龕），其後有梯可下一樓，屋頂為桁架系統，下釘木質天花。在造型上，臺南武德殿很明顯的具有屋頂、屋身及基座三部分。屋頂為由入母屋根（歇山頂）上突出頂破風所形成的複合屋根（十字脊頂），比較接近日本傳統的桃山式樣。正脊脊吻為鵝尾，入母屋破風除了五個小窗之外，尚有龜甲形懸魚、垂脊則以鬼瓦收頭。屋身方面於南北向採用木構件洗石子以入口為中心，作出左右各四開間，東西兩端實為樓梯。基座即為地面一層，處理上較為厚重但仍開窗以供採光之用。以新材料及新技術營建新的寺殿式樣在1930年代曾於日本流行一時，在台灣日治時期除了武德殿外，其他建築甚少使用傳統式樣，臺南武德殿是現存同類建築中最特殊而且最具代表性之一座。

原高雄市役所（今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役所原設於鼓山區湊町，1936年（日昭和11年）高雄市開始實施都市計畫，市內各區之性格日益明顯，政府各機關府衙有自鹽埕區移至前金區之趨勢，而且高雄州廳於1931年（日昭和6年）已由鼓山移至前金仁愛河邊。另一方面，由於日本於1937年（日昭和12年）開始發動太平洋戰爭，高雄市成為日本南進政策之重鎮，市役所之重要性相對提升，乃於1938年（日昭和13年）重建市役所於鹽埕區榮町。戰後高雄市政府接收此棟建築改為辦公廳舍。民國81年（1992），高雄市政府搬至新建完工的市府大樓後，此棟建築曾有被拆除的計畫，幸賴文化界極力呼籲才得以保存下來。

構架之斗
栱元素。
建築兩端
亦處理成
方 形 屋
頂，但尺
度比中央
塔樓略小
以有主從
之區分。



▲ 原高雄市役所室內柱式。

建築在中央塔樓與角樓之間屋簷及一、二層間之牆面均飾以日本傳統紋樣。

除了外貌上有帝冠風格外，此建築室內中央門廳之柱基本上亦很明顯的為日本傳統之木構架與西方柱式之混生體，在柱頭之部分尤其特別的特殊，可見到木構架之雀替構件與西方建築中之葉飾之結合，是為標準的帝冠柱式。此建築之造型，亦有人指稱整棟建築之造型宛若一中文「高」字。主要裝修建材在外觀上主要為鋼筋混凝土仿石材（仿木構件部分）與面磚。因當時日本已發動太平洋戰爭，所以在顏色上有採用淺青綠色，可能有軍事防禦上之考量。屋瓦則為類似軍用鋼盔之暗綠色。在改建為歷史博物館時，因為設計者之認知，拆除了室內一些具有特色的裝修，也加入了一些新的裝飾，引起了一些爭議，至為可惜。

新藝術與藝術裝飾式樣 台灣建築的式樣脈絡



台灣建築的 式樣脈絡



